

評柳書琴著《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曾士榮*



書名：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作者：柳書琴
出版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9 年
頁數：634 頁

作為一個在臺灣解嚴初期（1990 年代初期）投入臺灣研究的新生代研究者，作者柳書琴透過本書主題的研究與實踐，親身體現一個研究者如何在政治禁錮下長期壓抑、荒蕪的臺灣研究領域中，經過往後的十餘年間，透過跨學科、跨文化、跨地域的研究視野拓展，以及不同形式研究史料的深入挖掘，將此一新興研究主題逐漸推向更為細緻的論述與發展。本書於 2009 年出版之後，相信已經在臺灣文史研究領域中受到一定的重視，並且引起許多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對話。

一、本書論點介紹

首先，在方法論上，本書結合文學史與精神史的研究視角，並受到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的啟發。作者柳書琴在〈緒論〉中談到本書撰寫的原始動機，在於「有感於現有臺灣文學史重述基礎薄弱，文學詮釋疏離社會時空脈絡，文化內涵之闡述與評價偏重政治性，導致臺灣文化知識化過程面臨空泛化、扁平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1 年 3 月 4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5 月 18 日。

化的危機。」(頁4)因此,作者選擇從《福爾摩沙》系統諸作家的發展蛻變切入,為重述臺灣文學史提供歷史基礎;更具體的說,作者串聯對該集團「深具影響力的創建人王白淵」、「海外活動力旺盛的吳坤煌」以及「戰時發揮維繫本土文學脈動的張文環」等三位作家作為本書分析主軸,以觀察「殖民經驗、文學創作、鄉土意識、社會主義思潮在若干旅日作家身上展現的連動關係」,並採取較為深長的時間脈絡來細考「此一文學脈動在臺灣文學史、文化史或精神史的意義」(頁6-7);此透露出作者除了在方法論上採用文學史的研究視角外,同時也結合「文化史或精神史」的研究視角進行考察。再者,作者亦透露出本書在方法論上受到新歷史主義若干概念的啟發,為了能更適切的處理「從王白淵到張文環」此一文學脈動中「社會、意識、文藝交混的文化史水流」(頁22),而採取「以歷史之眼切入文學研究」、從「外緣觀察」殖民地文學史的研究取徑;換言之,作者選擇「從文藝現象與歷史脈絡的接點,探尋作品及思想產生的歷史語境,從而評估其意義。」(頁22-23)作者進一步解釋,此一文學史觀察的研究取徑之採用,是來自於新歷史主義幾個核心概念的啟發,例如「闡釋者的當代特質、史述的虛構性、敘述行為的物質限制、敘述方法與文化機置的互涉、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論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共謀性」(頁23)等概念。最後,作者展現其在相關史料搜集上的努力,特別是1990年代後期親自參與在臺灣、日本等地所進行的中、日文資料搜集與田野訪談等。(頁24)

其次,本書的主要論點如下:作者在第二章以謝春木與王白淵為分析對象,討論此類知識人的留學經驗與認同啟蒙的關係;作者認為謝、王兩人的帝都留學經驗與生活,後來證明是直接造成兩人從「前進東京」的朝聖之旅,轉變為「前進中國」變調之旅的原因;此一「變調」的歷程,體現在國族認同上是由「日本」而「中國」,而體現在各自的思想世界,則是「對殖民現代性的反思、對左翼母土家國的想像」(頁521)。第三章聚焦在王白淵《荊棘之道》一書的分析,繼續討論王白淵長達11年(1923-1933)旅日經驗中認同轉折的思想軌跡,以及當時的文學與思想魅力,如何成為影響那些同時代、背景相近的臺灣旅日青年的基礎。作者指出,王白淵從〈泰戈爾論〉(1927)到〈甘地論〉(1930)的寫作,思想上有往現實化、左翼化與行動化發展的傾向(頁108),也標示他的文明史觀已

臻於成熟的發展（頁 132）；而此一所謂「王白淵式的左翼東方文明論」，強調革命的目標不在以暴制暴，而在於健全人類文明進程，革命必須從扭轉西方文明獨霸、非西方世界的不幸與普羅階級的被壓迫開始。（頁 132-133）

第四章，作者先討論「前進中國」的謝春木與王白淵兩人「奔赴祖國」的目的何在，兩人著作中散播出何種「祖國想像」，以及此一「中國志向」對其他臺灣旅日青年的影響等。然後，作者討論王白淵現象對吳坤煌、張文環等臺灣旅日青年在文學與思想上的衝擊為何等問題；並指出，對「前進中國」的謝、王等臺灣青年而言，「新中國」比起「祖國」更為吸引人。因為這兩人都抱有「漢人」思維，卻受到孫文多種族共和說，甚至社會主義撤除民族畛域的國際世界觀等多元影響；所以，他們所寄望的「新中國」，是指向中、臺住民藉由革命所締造的符應多民族、全階級利益的新共同體（頁 171-172）。作者亦指出，在 1930 年代初期日本左翼運動整體式微與方向轉換的情境下，強調非法政治鬥爭的東京臺灣人左翼運動也面臨轉型，以林兌、吳坤煌與王白淵的聯繫開始，東京的臺灣左翼青年與文學青年之間激起文藝運動熱情，最後並順利將左翼運動朝合法文化運動或文學啟蒙運動轉型，王白淵在其間則扮演了關鍵角色。

從第五章到第六章，作者探討張文環、吳坤煌等人努力推動的臺中日左翼文學跨域聯繫、1930 年代張文環皇民奉公運動的參與、終戰前書寫母題與心靈動向，以及跨時代知識人晚年所進行的自我反省與時代答辯。作者試圖回答以張文環為代表的《福爾摩沙》系統作家，如何適應 1930 年代以來日本帝國軍國化的發展？又其臺灣論述在此一適應過程中產生何種調整與變化？戰前戰後他們如何參與公共事務，晚年又如何評價自己跨時代的表現（頁 521）？作者指出，當謝春木與王白淵將大革命寄望中國，而奔赴地平線彼方時，吳坤煌與張文環等《福爾摩沙》系統作家則專注於島內問題，以島內為中心向外思考。《福爾摩沙》系統作家關注鄉土書寫、文化抗爭、民族文學的建立與社會主義國際文化的締造等問題。又因他們擁有寬廣的文學視野與左翼鄉土觀，使他們深具蛻變的條件，並得以在日後以「文聯東京支部」為據點，開啟島內外、臺中日之間的跨域文學交流，這包括與中、日、朝鮮左翼文化人的深入交流，及終於與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本「人民戰線運動」接軌。（頁 387-388）

第六章則聚焦在張文環本身，指出其文學活動一直以建設母土文化、追求民族主體地位為標的，故長期以來被建構為被殖民民族自我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不否定這個抵抗面向的前提下，作者針對張文環於決戰時期奉公參與的活動等與日本帝國合作的面向，進一步加以釐清。作者認為，張文環因擁有某種能獲得注意的身分、能力或人際網絡，具備較高的被動員資本，因此肩負「被動員去動員」的任務；而他兼具的多重身分機能，也導致其多面性的奉公型態（頁 53）。作者繼而分析環繞在《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之間的戰時文壇認同戰中張文環的處境，並指出張文環透過「故鄉／傳統」的地理人文書寫，以回應帝國統治與殖民論述中對地方文化的破壞與扭曲，並展開與大東亞共榮圈相違的民族想像（頁 455-456、489）。「荊棘之道」是王白淵摸索捍衛的認同之道，也是景從其後的張文環等人，直到日本敗戰之前的堅持（頁 490）；最後，作者分析張文環寫於 1970 年代中後期、帶有自傳與自辯色彩的小說〈地平線的燈〉，認為其藉由「忠義的質問」，以回應戰爭末期自身涉入的動員經驗，以及看待與評價自己一代知識階層在時代中的起落問題。（頁 520-521）

二、評論

本書作者兼具文學史與歷史學的跨學科訓練，使她在進行《福爾摩沙》系列作家 1930-1940 年代的發展與蛻變的分析與重建中，在研究視野的觀照以及文史資料的細緻掌握與分析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現。由於本書係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¹ 書中多處可見作者對此一研究主題及其相關子題長期以來深入思索的痕跡。以下，筆者從兼具文學史與歷史學的跨學科視角（側重歷史學），對本書內容提出幾點就教於作者。

（一）綜觀全書的整體印象，作者的詮釋主軸似乎是以抵抗論為主，不論是謝春木、王白淵，或是吳坤煌、張文環，彼等在 1930-1940 年代的活動與作品，似乎都被作者詮釋為意識形態立場清晰、國族認同堅定的反殖民、反日本帝國的

¹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臺灣旅日青年。即使作者在第六章花了不少篇幅，討論張文環多面性的奉公型態與動員參與等戰爭協力活動，但對此作者仍以「被動員去動員」的詮釋觀點加以處理。對此，筆者擬從以下幾個角度提出質疑。

首先，就作者賴以分析的各種形式的文史資料而言，它們幾乎都是在不同時期經過出版而公開的資料，而缺乏個人私密的資料（如日記與書信等）。筆者理解關於王白淵與張文環等人的私密資料尚未出土（或根本不曾存在），當然無法賴以進行分析，但與王白淵、張文環等同屬旅日左翼作家的吳新榮，他的日記史料已完整出土（2008），² 足以提供一個立基於個人觀點所重建的理解角度與參考架構，使我們得以參照比較；並針對 1930-1940 年代期間如王白淵與張文環等旅日左翼作家，在轉向議題、戰爭動員的參與和角色，戰爭動員與國族認同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諸如「東亞新秩序」論述等戰爭宣傳的影響程度重估等相互交涉的議題，重新進行思考。針對吳新榮戰時日記的研究透露，在中日戰爭開始之後的 1-2 年間（即 1937 年底上海、南京淪陷後到 1938 年間），他對日本發動的戰爭由原初的反對逐漸轉為合作態度；此一合作取徑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為明顯，甚至衝擊吳新榮的多面向國族認同，進而（在 1945 年以前）產生向日本認同傾斜的發展。³ 作者在全書一以貫之的抵抗論詮釋主軸，雖然試圖將作家及其文藝作品放置於「社會、意識、文藝交混的文化史水流」中進行分析與理解，但作者此一結合歷史社會情境的用心，似乎仍未能使她得以適當評估並掌握發生在臺灣社會長達 8 年的戰爭本身（包括戰爭動員、戰爭發展與相應的戰爭宣傳論述），以及其所型塑的社會時代氛圍等關鍵面向（因素），對於像張文環等主題人物所造成的深刻影響。

再者，與以上討論相關的是，對於王白淵與張文環等人而言，國族認同或國族意識是否是本質性的存在？或者可因新情境的出現而產生差異性的想像與重構？

（二）筆者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謝春木與王白淵等人在 1930 年代初期「前進中國」？其主要考慮與目的為何？其在上海前後的情境為何？依照作者的解

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2008）。

³ Shih-jung Tzeng,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Chapter 2-3.

釋，謝、王兩人的帝都留學經驗與生活，反而促使兩人從「前進東京」的朝聖之旅轉變為「前進中國」的變調之旅。此一「變調」歷程，體現在國族認同上是由「日本」而「中國」，也就是兩人擁有的「祖國意識」；而體現在各自的思想世界，則是兩人「對殖民現代性的反思、對左翼母土家國的想像」（頁 521），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及臺灣、印度等弱小民族之地）實現的期待（頁 167-168）。以上論點看來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由於王白淵係稍後（1933 年 6 月）受到謝春木的邀請而前往上海，並加入謝春木所創立並主辦的「華聯通訊社」（創於 1932 年），「從事私人民間組織的諜報性工作」（頁 171），直到 1935 年 9 月離開這家位於上海租界的機構，進入上海美專教書；顯然「華聯通訊社」的屬性以及王白淵任職該社期間的活動相當關鍵，有助於釐清他的「前進中國」是否導因於自身「中國認同」、「祖國意識」或「社會主義革命」的考量。作者引用日本外交史料館關於王白淵的調查報告後，即指出他在這家由南京國民政府資助的機構中，負責翻譯日本廣電消息以供中國相關機構參考，印證王白淵「以實際行動往抗日路途前進」（頁 130-131）。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作者又說 1935 年 8 月該機構負責人謝春木「被國民黨租界幹員以有共產黨員與日本間諜嫌疑逮捕」，後因當地有力人士關說才獲釋（頁 131）；究竟國民黨指控謝春木具有「共產黨員與日本間諜嫌疑」的理由與事實何在？值得進一步細緻探索。而謝春木主持的「華聯通訊社」，是否有可能不單純只是一家「抗日」機構？

再者，究竟謝、王兩人任職於「華聯通訊社」期間的關係為何？是否如同本書作者所言的「難兄難弟」關係？根據日本外交史料館資料顯示，謝春木在臺灣民眾黨的好友黃旺成，也曾與王白淵在上海的該機構短暫共事過（約在 1935 年初）。據〈黃旺成日記〉（1935 年 1 月 19 日）所載，當時在上海的黃旺成曾介入排解謝春木與王白淵兩人之間「疑竇很深」的「隔膜」，黃旺成當日的紀錄寫道：「昨日追風〔按：謝春木〕告訴予之心情，王〔按：王白淵〕亦說了一遍，他們兩人可說是知己，但現在互於隔膜；王慕追風，而追風疑王賣友。」⁴ 此一紀錄點出謝、王之間的某種緊張關係，但並未言明兩人的「隔膜」是否具有思想上、

⁴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35 年 1 月 19-21 日，未出版手稿。

認同上、工作上或其他的意涵。筆者檢視黃旺成前一日日記（1935年1月18日），則可窺知謝春木當時的「心事」：「〔按：謝春木〕談起他的心事，謂年來奔走，心身俱疲；現時心境，只欲得些財源，或出洋，或往東京，或回臺灣以事休養。」此一紀錄似乎指向謝春木當時在「工作上」的挫折，並有離開中國，遠走海外的打算。然而，當筆者繼續透過〈黃旺成日記〉，從「日常生活」的層次重建當時謝春木的工作與私領域生活情境時，筆者發現謝春木當時低潮的心境，以及謝、王之間「隔膜」的產生，除了工作上的不順遂，也可能涉入私人感情上的糾紛。謝、王與黃旺成當時在上海因工作關係經常互訪，私底下也是熟友；〈黃旺成日記〉顯示，謝春木的妻子至少曾經兩度私底下向黃旺成透露「她與王白淵糾纏的事」，並承認她與謝春木之間的婚姻關係「並不自然」，而謝春木本身也頗為此事所苦。⁵

簡言之，若將謝、王兩人在1930年代初期「前進中國」的行動及其後在上海的活動，單獨解讀為這兩位「難兄難弟」實踐其「中國認同」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此一論點仍有進一步考究的空間。

（三）最後，筆者擬針對本書方法論提出討論。作者言及本書的處理，結合文學史與精神史（在此作者等同於文化史）的分析取徑。筆者最初的理解是，作者打算處理《福爾摩沙》系統作家作為一個旅日臺灣知識人社群的集體心態（精神）及其變遷等問題，但細讀本書內容之後，筆者理解到作者係聚焦在「殖民經驗、文學創作、鄉土意識、社會主義思潮在若干旅日作家身上展現的連動關係」的分析與討論上，以呈現這些作家的「精神圖像」；可以說，作者最後已經達成此一精神圖像的呈現。然而，作者在處理手法上似乎仍涉及許多選擇性的處理，這些包括「選擇」集中處理某幾位作家的某幾個相關面向，而無形中忽略了作為整體的某些其他面向及其「異議」。雖然因主題的設定而難以避免做出選擇性的處理，但作者也許可以說明這些選擇的考量與標準，以及為何某些與主題相關的部分卻不被選擇。舉例來說，作者以王白淵貫穿戰前（1920s-1945）的相關章節，卻在討論與他同一時代知識階層的戰後自我評價或「忠義自問」時，選擇以張文環的小說〈地平線的燈〉作「忠義自問」的分析，未能適度納入王白淵在戰後初

⁵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1935年1月4-5日、1935年1月7日，未出版手稿。

期的政治參與、文化活動與時論文章；而王白淵這部分的活動與書寫，正披露著他在戰後初期所經歷的另一階段「荊棘之道」。

無論如何，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一書，對有興趣於臺灣研究的研究者與讀者而言，絕對是一本不能忽略、具有高度可讀性的學術論著。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館藏，〈黃旺成日記〉（手稿），1935年，未出版。

柳書琴

1994 〈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9 《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2007-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Tzeng, Shih-jung 曾士榮

2009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